

# 试析“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创新

## ——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制高点

胡 建 王明徽

**摘 要：**“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价值创新的。这种“创新”的根本点在于：它预示了由工业文明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将会存在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其根据既是“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为切入点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论结晶，又是当代工业文明面临生态危机却难以自我克服，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解决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实现的现实使然。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生产方式上，它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统一与协调，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选择，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的行为，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它强调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使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并与闲暇一起变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从而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生活基础。在文化价值观上，它强调只有根据生态文明的生态理性来约束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并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人类才能在文化价值观上克服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危机”。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胡 建，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行政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311121）

王明徽，法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4-0083-08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准与全貌。作为人类的发展范形和生存方式，文明往往因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段，而这无不与自然处于不可割舍的关系中。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大致经历了“人类屈从自然”的原始文明、“人类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人类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工业文明的核心是工业产业，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据此，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后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指称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工业文明才可能完成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这基于工业文明抑或立足于生态文明反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具有质的差异。

### 一、马克思的慧识：对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批判

文明问题的质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和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事物一样，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都是被自然设定的。一棵树须以土壤、水分和阳光为存在对象；一只蜜蜂须以花和花粉为存在对象，也需要以它所属蜂群为存在对象。人所需要的存在对象更多，

他受到更多的条件制约,因此也就有更丰富的“对象性”。因此,单就“对象性”的存在意义而言,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sup>[1](168)]</sup>但另一方面,人与其他自然事物不同的是,人还具有“对象化”的生存方式,即人在以外部事物为存在对象的同时,就通过劳动实践把自己的目的、价值实现在客观事物之上,把客观事物改造为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属人的事物”。因此,劳动实践乃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具体形式,表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变换”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身的自然本性,面向大自然而升华为人。在这种意境中,人赋有双向性质——人设定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设定:人设定自然,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而人被自然设定,则表现为“具有自然本质的人”。人只有被自然设定,即在人的本质中包含了自然界本质的规定性,他才能真正成为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性”存在物;反之,人只有设定自然,才能使自身成为“对象化”的人,从而在区别其他生物方面的自我形象中回答“人是什么”。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界具有内在一致性——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方面是一个统一整体,所以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2]</sup>据此,人类不应该破坏自身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破坏人与自然的统一就等于损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发生了全面异化。马克思是从社会文化的逻辑来描述这种异化的。

首先,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性使得作为人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异化为支配人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本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之主要凭借,但在私有制条件下,“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事情,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肌体。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值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价值增值过程,这一点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sup>[3]</sup>

其次,这种事实的实质是工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异化,而它必将引发由“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标志着“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因为无论是资本还是科学技术,其本质都是劳动者“对象化”活动的产品,而异化则显示了“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sup>[1](91)]</sup>这就是说,产品原是工人劳动的“对象化”的产物,但却同它的创造者发生了对立关系,对象化成为丧失对象并受对象的奴役。这种事实的质底乃人与自然的全面异化关系。因为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本是人的对象化活动同对象的关系,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身的力量对象化到外部对象上去形成产品,必须以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为前提;自然界、外部物质世界在两重意义上为劳动提供生活资料:一是“劳动的生活资料”,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生产资料的东西,如土地、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它们,劳动就不能存在;二是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料,没有它,劳动者的就不能生存,当然也就没有了进行劳动的主体条件。人们劳动的目的,正是为了改造外部自然界,以便按照人的需要去占有这两种生活资料,占有外部世界。但是在异化劳动关系中,情况恰恰相反,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

占有外部世界，他就越是在两方面失去生活资料，既失去劳动活动的生活资料（劳动资料），又失去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成为这两方面对象的奴隶，并且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只有成为生产对象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挣得面包以维持生活；他也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不能不去劳动。据此，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他同整个自然界乃至整个外部世界、同一切劳动资料 and 一切生活资料之间的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的极端表现便是劳动者的需求不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sup>[1](91)</sup>而这必将导致由“生产过剩”来引发的经济危机。

最后，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生存方式才能真正克服。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工业文明必须奠基于市场经济，而市场的主体是资本，由此决定了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逻辑——最大化地追求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使得人们只能关注经济效益而不顾及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这种“人与自然的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解决。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条件下，由于个人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由社会来调节，并且其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这样，个人就有了充分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全面发展自身能力与素质的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是人类消灭资本逻辑之后的新型生活方式，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里的“各尽所能”，指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最能发展自由个性的具体劳动形式；而“按需分配”则指社会根据每个人自由劳动的需要分配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例如，喜欢作曲者获得钢琴与曲谱的使用权，热衷渔业者分得渔船与渔具的使用权。由于自由“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sup>[4]</sup>于是，人类可根据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意义来生活，从而克服了无限追求经济利益的工业文明之旧价值认同系统，据此也改变了无限剥削自然资源以求无止境消费的旧生活模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正确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实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1](120)</sup>。

由此可见，马克思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而展开人与自然异化关系之批判的。他揭示了异化的质底是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不合理性。依据这种视角，解决问题的向度被定位于：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新型生存方式。这种学理的价值在于：它为扬弃人与自然的异化提供了本根性的理论与实践根据。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它仅限于质底的深刻性而未概括事实的全面性，因此难以完成对异化的工业文明之生存方式的“全面批判”。这一历史任务留给了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揭示工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反自然本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马克思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使命的。这种新历史条件的重要特征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之后，特别是二战以来，进入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从正向度说，这个时代的到来，既是多个世纪以来人类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与自身文明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层叠累积与快速发展的时代性结晶。大科学表达着一种社会整体对科学技术的普遍认可和依赖：科技改造的不仅是自然与社会，还变革着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总之，科技改变了人本身。然而，从负向度看，人类在大科技时代不仅未能克服自身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还进一步将这种关系扩延为人类在工业文明中的生存方式。这其中的底据在于：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实现的生存方式的“合理性”，使得科技理性逐步取得了某种“准独立性”，成为工业文明的统治基础和内在逻辑。这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科学和技术的准独立的进步（quasi-autonomer Fortschritt），表现为独立的变数；而最重要的各个系统的变数，例如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取决

于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准独立的进步。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die Sachzwänge），而服从功能性需要的政治，则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性意识形态（als Hintergrundideologie），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化的力量得到发展。”<sup>[5]</sup>这就使得人类成为科技理性的工具，从而导致了工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全面异化。应该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体部分是社会批判，但本文为了自身论域的需要，重点论述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批判。他们指出：

其一，在生产方式上，由科技理性造成的异化劳动必然破坏合理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将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sup>[6]</sup>这就是说，自然界与人的物质变换关系，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据此，这种关系必须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以不破坏自然界再生的生态规律为限度。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流的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目的不是指向使用价值，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再生产中谋求资本的无休止增值。资本需要大量地吮吸活劳动和生产资料，这就导致了资本必须像剥削人一样来剥削自然界。资本增值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而维护资本逻辑的生产交换规则调节着社会的物质变换，并帮助资本成功地克服一切反对它增殖的界限。从一定程度上说，资本逻辑已经“失控”，它无情地损害着自然界的生态规律却不会给后者任何喘息和再生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却非常浪费。为了能使利润最大化，它一方面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对环境破坏进行治理。事实上，即使资本主义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但它们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进行，仍然是为了保证资本的顺利增殖，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将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这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缩小了人的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sup>[7] (128)</sup>这里所谓的“自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服从科技理性的外部自然界；二是被科技理性所压抑的人的自然感性冲动。马尔库塞由此强调，要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然的解放。所谓“自然的解放”，第一层意蕴是指解放属人的自然，即解放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第二层意蕴是指解放外部自然界，使之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sup>[7] (128)</sup>

其二，在生活方式上，由科技理性所造成的“虚假需要”必然引发人对自然界的无休止的“异化消费”，最终威胁到地球万物的生存。资本主义为了避免由“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制造“虚假需要”，把经济危机转嫁到消费领域，使异化消费成为化解经济危机的有效途径。所谓“虚假需要”，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真实自我异化的虚幻活动。”<sup>[8]</sup>也即人们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物品，而是为了占有物品。据此，消费披上了“幸福”的外衣，成为财富和价值的象征，手段成为目的，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sup>[9]</sup>然而，正是这种高效率和高消费的人类生存模式，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正如日本社会学家见田宗介所指出的：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的特征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因为“这一体系在它的生产的最初起点和消费的最终末端，都必须依存于地球这颗行星及大气层中‘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条件，只能在这种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存在并成立。”据此，异化消费中的大量废弃物不能被自然界业已形成的生态系统所容纳和消解，成为地球上多余的物质，即成为破坏生态系统的外来因素。异化消费的最终后果只能如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所指出的：在

人类对自然生物的无限掠夺式消费中，“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或者人类自身互相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的全部动物和植物，如果地球符合一种著名的论断还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万物就会从最低级的阶段重新开始。”<sup>[10](213-214)</sup>

其三，在文化价值观上，科技理性的功利化意识形态必然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危机”，最终导致人类生存意义的异化。由“异化生产”与“异化消费”构成的全球性的社会存在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只能是对自然界的功利性索求思想，这种理性不仅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物类之间的习惯性的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的不平等的或单向性的“目的”（人类）与“手段”（自然物类，包括自然生物与动物）关系，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方式的目的性之“合理性危机”。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所指出的，理性的宗旨是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然而，人征服自然的结果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相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引发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说明，作为工业文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科技理性是以偏概全的，它作为一种现代性价值取向，表现为整体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自然物类被给予了一种被动的工具意义的理解，而人类却自我赋予了一种绝对主动的自我目的性的优越地位，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人类由于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的物质效用而无视其对人的精神意义，必然导致人在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的同时，也使自身异化为只追求物质享受而无精神需要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据此，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断言：科技理性的实质是：“无限地统治自然界，把宇宙变成一个可以无限猎取的领域，是数千年来人们的梦想。这就是男人社会中，人们思想上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是男人引以自豪的理性的意义。”<sup>[10](235)</sup>

由上述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批判。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他们的“科技理性批判”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不仅源于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方式的私有制，而且与工业文明的商业消费逻辑、功利价值体系浑然一体，因此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工业文明中的全面异化。然而，在他们的时代，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后工业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实现的条件，因此使他们找不到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出路。这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仍然限于工业文明，无法在否定科技理性之后发现人类文明的前途。因此，他们只能一厢情愿地倡导观念革命。例如马尔库塞就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价值和艺术整合到科学技术之中，作为其内在要素，实现科技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就可以扬弃科技理性的异化。他说：“如果对自然的改造成功地把控制与自由连接起来，把控制导向自由，那么在此成功的地方，美学与节俭便出现了。在此情景中，对自然的征服也减少了自然的盲目性、残暴及生产率——这暗含着减少人对自然的残暴。土壤的耕作在质上不同于对土地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质上不同于对它们的挥霍浪费，森林的集材在质上不同于大规模的砍伐。贫困、疾病和癌肿性发展是人及自然的疾患——它们的减少乃是对生活的解放。”<sup>[11]</sup>

###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创新：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制高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未能走通的路径，总是有人要继续开辟的。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续了他们未竟的事业。“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据在于：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当人类的总体消耗和一部分人的极度消耗已让自然界无法承受的时候，人与自然的矛盾构成了最为尖锐的、可以相互毁灭的矛盾：人在小范围内改造了自然，使其成为“属人的自然”，但这同时就在大范围内破坏了自然，而被破坏、被“熵化”的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形成了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这就是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大的不合理性，它导致了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了现代人类在历经工业文明的生态苦难之后的生态文明觉悟，也是社会主义者渴望挽救地球家园的当代表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安德·高兹等人。生态社会主义指出，生态文明乃当

代文明视野的制高点,只有立足于这一制高点来审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消费方式)、文化价值观上的全面反生态性,才能发现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与生态文明之间存在着的本质差异,据此,在共产主义还没有条件实现的今天,人类扬弃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才是现实的通途。这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所追求的经济系统与生态文明所需求的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反馈对立的性质。这其中的底据在于,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循环系统,生态规律究其核心,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规律,它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而工业文明所追求的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载体的人类社会再生产系统,它必须不间断地与资源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才能存在和发展;经济规律究其核心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并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其前提。这决定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各自具有不同的反馈机制:经济系统是追求增长型的,即要求不断加大系统的投入和产出,实现经济系统的不断增长,因而对于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等各种物质要素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生态系统是要求稳定平衡型的,即要求其系统的各物质要素在发展中趋向动态平衡之稳定状态。这样,双方的对立突显出来:经济系统生产过程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以及生态系统调节和自净速率与经济系统排污增长速率之间的矛盾。

“生态社会主义”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典型代表是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观”仅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只能昭揭出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但限于工业文明的视角而达不到规律性的认识;只有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生产方式还存在着与生产条件(奥康纳所谓:“那些并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之间的“第二重矛盾”,由此才能揭示出生态危机的必然规律。这规律表现为:其一,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不可能跟上资本自我扩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产条件的制约,体现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其二,工业文明生产体系的无限扩张本性肯定会引发“二难困境”:如果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与日俱增,原料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而资本也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从而引起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以及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而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则会带来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低廉,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大和积累的增加,并致使资源快速消耗。总之,工业文明生产过程的结局只能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多的消耗以及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而这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而进一步加重经济危机。因此,工业文明在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

据此,奥康纳认为,必须建构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以取代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原则区别在于“分配性正义”与“生产性正义”。由于工业文明植基于个人本位的私有制,因而必然强调“分配性正义”,其前提任何东西包括健康、寿命、安全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都能够根据市场的标准进行公平的分配和补偿;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据此也将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于是,“在今天,正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劳动进程以及使用价值已极为广泛地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样,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从其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sup>[12](538)</sup>这就是说,要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摆脱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是一种非市场性的生态正义模式,它强调需求最小化,从而使“消极外化物”(不符合生态文明的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符合生态文明的

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sup>[12](529)</sup>

其次,在生活方式上,工业文明所追求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物尽其用”模式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方面的底据在于,工业文明的尽速发展观促使人们必须依赖现代科技快速刷新产品的“价值”(“交换价值”的基础),因为只有资本循环周期越来越缩短的社会里,生产率才会越来越快地增长,而这必须有与之相契合的消费,生产才能得以维持,所以,商业的刺激消费成为其营销方式的重中之重;这使得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成为消费社会。然而,人们消费生活更新的速度越快,就会越陷入消费生活之中,也就越远离自己真实而自然的生活;而且,当我们消费生活更新加速的同时,生态文明所要求的自然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耗却不会因为我们消费生活的加速而加速,相反,相对于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周期缩短而言,其“使用价值”被消耗的周期却相对地增长,这就必然加大自然界自我循环的负担;而当自然界无法承受这种增加了的负担或超过自然界消耗“产品”的自然周期的极限时,生态危机遂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

“生态社会主义”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典型代表是阿格尔的“劳动——闲暇”二元论。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仅注重“异化劳动”而轻忽“异化消费”,所以认识局限于昭揭工业文明的生产领域之弊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谈到了异化消费,但他们是立足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转移至消费领域的视角发论的,因此也未能诠释异化消费的内在底据。阿格尔驻足于生态文明的立场揭示出异化消费的质底:人们要用消费的虚假满足来填补由异化劳动造成的现实痛苦。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中,异化劳动造成了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格局: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只有在闲暇时间中才能享受自由和幸福,因此,这种“享受”的具体表现便是异化消费;它实质上是人们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而把自由与幸福寄托于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中。在这个意义上,异化消费指称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sup>[13]</sup>然而,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是有限的,它根本不可能支撑人类对异化消费的无限欲求,这就迟早会导致人们异化消费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而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生效之后,真不知人类将以何种生活模式继续生存下去。

据此,阿格尔提出了“非官僚化”的解决对策:因为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日益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使工人的劳动呈现为日益破碎化和机械化的异化形式,他们不能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体会不到劳动的创造性和愉悦,由此产生了“劳动——闲暇二元论”;所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非官僚化”的改革——反对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让工人参与生产决策和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的欢欣,树立劳动和闲暇一元论,把劳动看作是自由与幸福的源泉,以此改变因“虚假需求”而引发的“异化消费”之生活模式。

最后,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所形成的物质欲望膨胀与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精神需要之间产生无可规避的悖论。这方面的底据在于,消费社会必然产生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性欲望的满足才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个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质财富才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象征,这导致了人对自然只能具有物质性的索取关系。而这与生态文明倡导的人对自然的精神需求大相径庭。生态文明认为,人与自然不仅具有物质性的联系,还应该具有审美性的精神关系。它培养人的超越精神,将人从狭隘的唯功利心态中,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单纯的“经纪人”、充满物欲的人,扩展为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平衡发展的人;使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受制于物欲而被拒斥、遮蔽、消解乃至丧失。这样,不仅人性得到回归,而且由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而使人对自然增加呵护与爱恋,生态环境也由此受到保护。

“生态社会主义”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典型代表是高兹的“生态重建”思想。依据高兹的视角,马克思仅关注了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异化而很少涉及生态理性,因此缺失更高层面的异化批判;而西方

马克思主义只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性批判具体化为科技理性批判,仍然未找到文化出路;只有根据生态文明的生态理性来反思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人类才能在文化的制高点上克服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危机”。据此,高兹深入肌理地指出,人类的“生态重建”思想存在两种向度。一种是工业文明的向度。它企图在不妨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解决生态问题,因此,虽然也提出“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的口号,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完全意义的,因为工业文明的前提不允许这种“服从”成为事实,所以,“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引起与破坏生活的自然基础有同样多的危险。”<sup>[14]</sup>另一种是生态文明的向度。高兹指出,生态文明的目标是限制经济合理性,并使其从属于更高的合理性——生态合理性,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不是资本的尽速增殖,而是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或共同幸福,这样,它就可以与生态文明的要求保持一致:经济发展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的“社会——生态”为目标,从而使生态保护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

高兹进而指出,生态文明意义的“生态重建”与工业文明的“环境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它包含范式的转换,并且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更少但是更好”,即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然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并致力于减少经济理性和商品交换使用的范围,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

由以上可见,“生态社会主义”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价值创新的。这种“创新”的根本点在于:它预示了由工业文明(马克思指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至共产主义(马克思指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的自由劳动”发展阶段)之间,将会存在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其根据既是“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为切入点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论结晶,又是当代工业文明面临生态危机却难以自我克服,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解决方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无法实现的现实使然。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生产方式上,它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统一与协调,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选择,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的行为,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它强调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使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并与闲暇一起变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从而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生活基础。在文化价值观上,它强调只有根据生态文明的生态理性来约束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并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人类才能在文化价值观上克服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危机”。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8-20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3.
- [5]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
- [7] 马尔库塞.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8]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香港:中国文艺出版社,1988:134.
- [9] 弗洛姆.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74.
- [10] 霍克海默,阿尔多诺. 启蒙辩证法[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11] 马尔库塞. 单面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05.
- [12] 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4.
- [14] 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42.